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Academic Library
Wuhan University

学科互涉与 文学研究方法论革命



冯黎明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学科互涉与 文学研究方法论革命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Academic Library

冯黎明
著

Wuhan Universi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论革命/冯黎明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9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978-7-307-13659-5

I. 学… II. 冯… III. 文学研究—方法论 IV. I06-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4477 号

责任编辑: 白绍华

责任校对: 汪欣怡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44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3659-5 定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论 人文科学方法论与知识的学科化问题	1
一 本体论时代的方法论	1
二 认识论时代的方法论	5
三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之争	12
四 语言论转向与方法论	17
1. 从逻辑经验主义到分析哲学	18
2. 从现象学到阐释学	21
3.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25
五 20 世纪其他方法论思潮	30
1. 弗洛伊德主义	30
2. 科学哲学	32
3. 批判理论	35
六 知识学科化时代的文学研究方法论	37
第一章 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属性	42
一 作为反思性知识的文学研究	42

二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学研究	47
三 作为前学科性知识的文学研究	52
第二章 文学研究的学科知识体制化进程	57
一 “英语”的体制化	58
二 癸卯学制：开启中国的知识现代性工程	62
三 从中央大学到院系调整	65
四 文学主体性与审美解放	69
第三章 文学研究的知识学依据	73
一 文学研究的学科化：一项未完成的工程	74
二 美学与文学研究	76
三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	79
四 社会学与文学研究	82
五 心理学与文学研究	86
六 人类学与文学研究	89
七 文化研究：后学科时代的知识生产	92
八 文学研究：一场知识学的战争	96
第四章 文学研究中的学科知识互涉	100
一 学科自律与学科互涉	100
二 文学研究：现代知识战争	104
三 从前学科性到学科间性	108
第五章 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	113
一 批判理论与实证理论	113
二 形式定义与语境定义	117
三 学科自主与学科互涉	122
第六章 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对立	127
一 文学研究的两种理论路径	127

二 先验理性与经验实证·····	131
三 知识的学科化与跨学科·····	134
四 理论范式的建构与转型·····	138
第七章 文学史论：总体历史与学科历史·····	141
一 文学研究的史学化·····	141
二 文学研究与历史理性·····	148
三 走出方法论困境·····	155
第八章 意义论：阐释的学科化与学科间性·····	163
一 知识学科化与文学意义论·····	163
二 语言论转向与文学意义论·····	168
三 意义阐释与方法论·····	176
第九章 作者论：诗学天才与意义主体·····	183
一 传记研究之“传记”·····	183
二 传记研究在中国·····	190
三 传记研究的知识学合法性·····	194
第十章 形式论：能指主义与形式化方法·····	200
一 形式化：知识学的现代性工程·····	200
二 形式化思维与文学形式·····	204
三 形式研究的方法论困境·····	207
四 形式的扩张与形式化的式微·····	211
参考文献·····	215
后 记·····	261

导 论

人文科学方法论与知识的学科化问题

跟本体论、价值论、存在论等一样，方法论在人文科学知识体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如果说任何知识都是某种特定方法实践的产物，那么方法论作为关于方法的理论反思则体现出人文科学的一种自觉。事实上方法论的自觉是近代思想的重要成果，古典时代仅有亚里士多德在方法论问题上作出过思考，而近代以来尤其是现代思想文化中，方法论几乎成为每一位思想家都必须付出智力的论题。比如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学者的论著中，方法本身呈现为一种思想，甚至构成知识生产的核心机制。即使是保罗·法伊阿本德的“反对方法”一说，仍可以视作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在 20 世纪的文学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学史上各种方法论的深刻影响，诸如实证、批判、分析、阐释、描述等，在文学研究领域里随处可见。

一 本体论时代的方法论

古典时代的思想大多属于本体论范畴，即那时思想文化的核心

主题是宇宙的本质属性问题，思想者们要从事的基本工作是为人类生活世界的全部现象寻找共同的“本因”。古典时代的本体论不同于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类本质”，即解释同类事物共同的存在特性的本体论。古典时代的本体论是一种总体性思想，它以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为生活世界设定终极的决定性力量，用至高无上的“一”来统摄形而下的“多”，从而建立起整一性的意义阐释体系。

古典本体论思想包括三种基本形态：其一是超验性的神学一元论，其二是形式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其三是在场形而上学。当然这三种宇宙本体之间又呈现出家族类似的关系。

超验性神学一元论集中体现为各种一神教神学哲学，其中尤其是以犹太教、基督教最为典型。一神教宇宙观念认定世界源于超验神的意志，因而大地上纷纭复杂的现象内在地趋向于一个统一意志，即给予现象以存在性的神。神创造了世界并统一了世界，世间万物存在的意义均在于它们分享、折射、领悟、承受着神的旨意。大多数一神教的神其实来自于特定民族的文明史，而并非思想家们的发明。作为民族文化精神之汇集的神学一元论，就其生成的方法而言，它是非自觉性的，因为它来自于生存经验的历史积淀而非方法论意义上的归纳推理论证。但是这种本体的生成过程中仍有某种“方法”在发生作用，它预设一个超验的人格神来建立总体性和同一性的意义原则。预设、总体性、同一性、超验性便成为超验神学一元论的方法论特征。就此而言，古典时代的一元论神学乃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源头。

形式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常常与多神教有关联。多神教宇宙观在提供总体性意义方面缺乏力量，因此古典思想便滋生出一种在诸神之间构建统一结构的冲动。在亚历山大的斐洛把逻各斯与基督教神学的上帝联系起来之前，希腊哲学家手中的逻各斯就是世间万物共同的构成方式。自从赫拉克利特把逻各斯这个词(λόγος)引入哲学之中，在诸神之间找不到统一意志的希腊思想家们似乎发现了一个能够提供同一性真理的东西。逻各斯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家们谈论的“道”，具有宇宙本体的性质但又不是超验的人格神。逻各斯一词原本与言语、语法有关，因此它更多地显现为一种形式化的

结构，当然是一种普遍性的结构形式。对于多神教的希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神能够像犹太教的耶和华一样为全部存在提供一元化的本体论依据，因此逻各斯这种结构形态的所谓普遍规律就被寄托以总体性和同一性的意义生产职能。相比起神学本体论，逻各斯中心主义更靠近理性，于是也较多地体现出方法论的自觉，因为作为结构形态的逻各斯只规定了思想的架构而不规定思想的内涵，这种架构有着较为明显的应用性功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逻各斯演变为逻辑，这就说明逻各斯本身具有规定思维程序的方法论意义。但是正如海德格尔、德里达等现代思想家曾论述的那样，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源在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因为它奠定了西方思想关于存在的基本理解。由此观之，逻各斯的本体论功能仍然强大。

所谓在场形而上学，意即一种以在场事物为普遍规定性来解释全部存在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一神教的上帝意志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逻各斯都带有强烈的超验色彩因而属于观念对存在的本体论规定，那么诸如泰勒斯的“水”、老子的“道”，以及中国哲学中的“气”等，都是用某种在场事物充当全部存在的本因。当古典思想家们认定某一实体性物质具有创造一切事物的功能并将其视作宇宙本体时，纷纭芜杂的现象便被统摄为具有总体性和同一性的存在，而诸如“水”、“道”、“气”一类在场事物也上升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规定性。在场形而上学的根本在于开创出一种把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注入实在的思维传统，这一思维传统引导后来的思想家们总是希望在个别现象中找出超越个别性的普遍规定性。这里就见出了一种方法论，即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方式。相比西方哲学，中国的在场形而上学更多关注的是人类的伦理规范，所以中国古典的本体论哲学最后都走向了理学这种伦理学的本体论。

古典本体论哲学在方法论上处于不自觉状态，但是这种不自觉状态下的思维仍透露出一些方法的特点。首先，古典本体论哲学是一种总体性宇宙论。这一哲学观念要用“一”来规定“多”，其要旨在于设定一个一元化的本体来解释整个宇宙。其次，古典本体论哲学用先验预设的方法来构造那决定芸芸众生的最高的存在。在缺乏严谨的逻辑规范和科学认知手段的时代，古典哲学家们以一种自

由联想的方式制造了上帝、道、逻各斯、气等并遵之为宇宙的本源。再次，古典本体论哲学是一种因果决定论的思想，这一思想在本体和现象之间设定了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后来的哲学认可本质决定现象，其根源即在于古典本体论。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总结古典哲学时说：“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唯一的真理，而同时把它当做源泉，一切其他事物，自然的一切规律，生活和意义的一切现象，都只是从这源泉里流出，它们只是它的反映——或者把所有这些规律和现象，依照着表面上似乎相反的路线，引回到那唯一的源泉，但为的是根据它来把握它们，这就是说，认识它们是从它派生出来的。”^①虽然在黑格尔的时代西方哲学已经发生认识论转向，但是古典本体论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影响仍然持续存在着，黑格尔本人就未能完全摆脱总体性、同一性以及本质主义。

在古典本体论哲学中，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身处古典哲学殿堂的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在竭力保持与古典本体论哲学的超验性、预设性和总体性的距离，他把本体论从一元论、宇宙论和决定论拉回生活世界，提出了一种存在本体论，这是一种由事物的类特性归纳出存在的普遍性的方法。亚里士多德走出了柏拉图理念论的范式，致力于在现象自身中理解其存在。关于“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他写道：“有一门学问研究‘作为是的是’，研究那些自身依存于它的东西。”^②这种“是”是分类意义上的“是”而非“一切”意义上的“是”。通过修辞学、逻辑学、伦理学、物理学、政治学、诗学，他对生活世界的诸现象进行了类似于现代学科分类的考察，希望找到这些现象自身的属性，同时在《形而上学》、《工具论》、《范畴篇》中他又在普遍性层面上叙述了现象存在的诸种共同的规定性，这种本体论在方法论上就不同于超验本体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总结了“归纳”、“演绎”两种基本的论证方式，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4页。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6页。

其实就是他的存在本体论哲学的思维方法，即从诸现象中归纳出现象自身的存在属性，又由这基本属性的规定演绎出个别现象的存在特质。亚里士多德只是将归纳、演绎放在逻辑层面讨论，其实作为方法它们已经超出了逻辑学范围，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他的存在本体论的方法论实践。

古典本体论哲学是在前学科的知识整一性时代形成的，因此它必然要以关于统一宇宙的总体性理解为最高真理，这也决定了古典本体论哲学在方法论上缺乏一种分析意义上的自觉。古典哲学家对他们的宇宙本体秉持着一种信仰，信仰是不需要论证的，当然也不需要方法。

二 认识论时代的方法论

文艺复兴之后，神学意识形态统治的衰落使得古典本体论哲学逐渐让位于建立在个人主体性基础之上的认识论哲学。

认识论哲学将古典本体论哲学关于终极真理的追问转换成关于人类如何认识真理的追问。认识论转向摧毁了古典本体论哲学的统一宇宙论，它把人与自然区分为两个世界并在此前提下讨论人对自然的认知如何可能的问题。在从笛卡儿到康德的一系列认识论反思中，作为主体的人从物质世界分离出来成为从外部观看、言说世界的知识活动的主体，因而哲学的主题必然由何为真理转向我们关于真理的认知如何可能的问题。该问题不仅指向我们的先天禀赋，进而更是指向我们以何种方法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反思，于是认识论转向必然地激发了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自觉。

知识的确信是所有认识论哲学共同的思想诉求，因为无论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把确定性知识的获得视为对真理的掌握。事实上这一点正是上帝死了之后人类重建存在的合法性的需要所致——他们需要一个确定性的生存世界。而如何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确定性知识，这一问题注定成为认识论哲学进行方法论反思的学理中轴线。

就像所有现代思想都或多或少承继着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

主义两大哲学潮流对立的故事一样，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探讨也可以视作现代思想的方法论诉求的起源。我们在 16—18 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有着共同的知识确定性价值观同时又相互对立的方法论，即大陆理性主义的“反思—演绎”方法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实证—归纳”方法。

笛卡儿哲学是近代方法论自觉的开端，在《探索真理的指导原则》和《第一哲学沉思录》等著作中，笛卡儿对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作为理性主义者，笛卡儿特别推崇数学方法；他似乎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概念，但是当年的本体论现在演变成了方法论，数量关系由宇宙的构成原则变成了认知宇宙的手段和路径。笛卡儿将数学视为一切学科知识的起源，视作通往其他科学的道路。作为一种认知方法，数学能够赋予现象世界以自明性，使之被理性准确地掌握。在《方法谈》中他写道：“我所说的方法，是指确定的、容易掌握的原则，凡是准确遵行这些原则的人，今后再也不会把谬误当做真理，再也不会徒劳无功瞎干一通而消耗心智，只会逐步使其学识增长不已，从而达到真正认识心智所能认识的一切事物。”^① 那么这些原则有什么样的内涵呢？笛卡儿具体地陈述了四大方法论规定：

第一条是：绝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东西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卒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

第二条是：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

第三条是：按照次序引导我的思想，以便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识，即便是那些彼此间并没有自然的先后次序的对象，我也给它们设定

^① 笛卡儿：《探索真理的指导原则》，宫震湖译，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14 页。

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是：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们确信毫无遗漏。^①

这四条原则要达成一种“自明性”的知识学境界，而达成那境界的根本在于从数学公理这一先验的天赋观念出发去将全部现象整合为一个有序化的逻辑结构。对于笛卡儿来说，真正的知识是简约、自明、包容的，因为它来自于先验我思的天赋观念，数学公理就是这样的观念。由此我们看到，许多年后的现象学很好地继承了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其“还原”和“意向性”等概念都建立在笛卡儿哲学的前提之下。另一位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延续笛卡儿的方法论提出从“真观念”出发的演绎推理法，这一方法的基本范式即欧氏几何的公理推论。理性主义者大多强调发自先验理性的公理推论，他们认为只有建立在先验理性的公理基础之上的关于事物的知识才是确定的。莱布尼兹说：“……也有两种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的反面是可能的。当一个真理是必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分析法找出它的理由来，把它归结为更单纯的概念和真理，一直到原始的真理。”^②很显然他以“推理的真理”为真正的真理，因为推理的真理来自于“原始的真理”，即理性的先验公理。理性主义者依据他们对先验的自明性观念的崇信论证出一种“自明性原则+演绎”的方法。这一方法主张人类理性所先验地规定的天赋观念，即那些终极性的、不证自明的原则，并且强调全部知识都来自于自明性原则的演绎。

大陆理性主义的方法论的直接体现乃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所谓“思辨”。大多数思辨哲学家都致力于寻找那不证自明的先验原则，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64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82页。

诸如黑格尔的绝对心灵、费希特的绝对自我等。他们视这种先验性的演绎形态为生活世界的真正内涵。思辨哲学的基本思想程序是，首先确定先验理性的内涵，然后由之演绎实在事物的表象形态和历史。

在主客体二分的思想语境中，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力图通过设定生成于主体的终极性原则来为主体的认知活动提供确定性支点和程序，而另一种认识论哲学潮流即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则希图在客观实证中建立知识的确定性。

经验主义哲学主张知识来源于我们对外部事物的感觉经验，这直接导致了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形成。经验主义哲学的开创者弗朗西斯·培根认为科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发现自然规律，这跟理性主义者热衷于寻找先验理性迥然相异。在方法论问题上，培根以为观察、实验、归纳才是科学知识得以形成的真正机制。他具体地论述了归纳法的原则和操作步骤，而且指出亚里士多德归纳法的缺陷。出于对感觉经验的肯定，培根在他的归纳法三步骤中最重要的第二步中放入所谓“三表法”，即“存在表”、“差异表”和“程度表”；培根认为，三表法能够把散乱的经验材料有序化。培根方法论的核心就是通过感觉经验发现现象的客观性质，这一点在后来的经验主义者手中被强化为一种实证主义的知识论。

到洛克那里，感觉经验在认知中的首要性位置得到明确的肯定，同时他提出一种激进的“白板说”来批驳大陆理性主义者对先验理性的信仰。洛克认为：“我们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① 这种对感觉经验的知识功能的推崇为知识的实证化以至于为实验科学都提供了思想基础。但洛克不像他的前辈培根那样思考感觉经验上升为知识的方法，而是把兴趣放在“天赋人权”这类政治哲学观念上。

在认定实证性的感觉经验为知识的来源这一点上，休谟跟洛克是一样的，《人性论》这部书的副标题就是“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50页。

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但是休谟比洛克更为清醒地意识到知识生成的复杂性，尽管他坚定地维护感觉经验的首要性而且明确地反对思辨方法，但是他也注意到“知识”与“信念”的差异，注意到除了关于“实际的事情”的纯客观知识以外还存在着关于“观念的关系”的抽象证明的知识——比如几何学、数学。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休谟关于“是”与“应当”即涉及“知识”与“信念”的区分，这一区分直接影响到康德把合概念性的知识与合目的性的价值划分为两个领域。但是休谟虽然意识到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有所区别，却仍然坚持把他兼顾经验与逻辑、实验与推理的方法用于精神科学。其实精神科学的对象与“信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按照休谟自己的思路，从“是”中引不出“应当”来，因此在精神科学中推行实验推理方法是否恰当的确是个问题。休谟的实验推理方法在遭遇有关信念问题时必然生出许多迷惑。

康德说休谟使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过来，这主要就是指休谟关于因果律和信念论的反思使他意识到信念并非建立在因果必然性基础之上。被称作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康德思想，其核心在于所谓“先验逻辑”方法。康德并未否定客观事物在知识活动中的存在，但是他视为“物自体”的物质现象是一种无法自我呈现其意义的东西。知识意味着存在之意义的呈现，这一呈现须由主体的先验逻辑赋予物自体方可实现。康德写道：“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而且我们必须不是通过检验，在自然界里去寻求自然界的普遍法则；而是反过来，根据自然界的普遍的合乎法则性，在存在于我们的感性和理智里的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中去寻求自然界。”^①这也就是说，关于自然界普遍法则的认识并不是自然物的自我呈现，而是主体的理智对自然物的投射使然，因此“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只能在我们的先验理性中才能找到答案。对于康德而言，所谓自然哲学是不存在的，哲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反思我们的理性。既然人关于自然法

^①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2页。

则的知识来自于主体的先验理性，那么理性主体的自我反思则成为揭示知识生成机制的唯一途径。康德哲学由此走向了“反思”（他称为“批判”）的哲学；他的“三大批判”都指向人自身的先验性，探讨先验逻辑的形态和构成方式。这种主体以自身为对象的反躬自省式的思维方式（反思）乃是康德先验哲学必然选择的方法。

关于康德哲学的方法论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他的“分析”方法。康德在对范畴、概念、质量、因果等进行形式层面的叙述时运用的是“分析”方法。罗素说：“分析可以定义作是对一个既定复合体的构成成分及联系方式的发现。”^① 康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分析方法的，比如他依据先天综合判断原则对形式逻辑的判断进行“量”、“质”、“关系”、“样态”四组十二种形式的分类陈述。康德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当他将人的先验性分解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三个部分并分别描述各部分活动的诸项规定性时，一种与知识的学科化进程相吻合的思维方式初现端倪。康德将合概念性、合目的性与形式游戏分别归入主体活动的三大领域，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科学、伦理信念和审美体验三种主体活动的差异性。人们从这里获得启迪，意识到古典时代的宇宙整一性的知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独断论之上的，而19世纪逐步形成的自然科学和实证方法的知识学霸权，同样是一种独断论。

相比康德，黑格尔哲学显示出浓郁的“哲学王”的意味。黑格尔并不满足于康德那种单纯的主体性的自我反思，他要言说的是全部生活世界及其历史。黑格尔力图建立一个完整而庞大的生活世界谱系图，一个由心灵、实在、时间、空间等复杂地联系起来的大同世界。黑格尔声称：“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本质上应是一个体系，因为真理是具体的，它必定是在自身中展开其自身，而且是必定联系在一起和保持在一起的统一体，换言之，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各个环节加以区

^① 转引自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别和规定才有可能。”^① 人类解放和个性解放都是现代性工程的设计项目，但是黑格尔更关心前者而康德更关心后者，所以黑格尔哲学是一种总体性思想，它将生活世界和人类历史安装在绝对心灵与实在之间的所谓辩证关系这一主轴之上，构成一部按照总体性原则运转的宏大机器。就方法论而言，黑格尔最为关注的是怎样将构成生活世界的各个部分以及构成世界历史的各个阶段以一种“普遍联系”的方式装配成整体。正是这样，黑格尔发明了一种建立普遍联系的方法——辩证法。对于黑格尔来说，理念与感性、心灵与物质、形式与内容、本质与现象等均处于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相互否定而又相互肯定、相互扬弃而又相互转换的互动关系之中，就像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互为存在的条件一样。这种复杂的关系使得生活世界总是在运动中进步。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述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述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解释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② 绝对心灵与实在之间的辩证关系推动生活世界朝向自由王国进步，这里的辩证法既是黑格尔眼中的世界历史的内涵，也是黑格尔发现这一内涵的方法。

哲学史的认识论转向不仅带来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思想潮流的对立，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带来了知识的学科分类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科化方法的竞争。经验主义强调客观化的感觉经验的知识学功能，自然现象的多样性要求这种认识论按照“物以类聚”的自然原则分解为类型学意义上的知识，知识的学科化便逐步形成。对于理性主义来说，肇始于笛卡儿的“分解式理性”发展到康德时演变成关于主体理性的分类规定性的反思；康德把人的先验性区分为三个自律的部分，这一思想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学走出古典的总体性和同一性范式趋向于学科类型划分和独立的主体条件。知识的学科分类一开始就区分出两种有着明显差异的学科：自然科学和人文

^①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6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